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

Jindai Zhongguo Jiaoyu Shehuixue Yanjiu

许刘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

Jindai Zhongguo Jiaoyu Shehuixue Yanjiu

许刘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 / 许刘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161 - 8382 - 3

I. ①近… II. ①许… III. ①教育社会学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G40 - 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334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秦 婵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32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史学家库恩 (T. S. Kuhn) 在撰写《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科学史”条目时,将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内部史 (in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 和科学外部史 (ex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他阐释道:所谓内部史主要关注科学知识的创造,旨在揭示科学理论和方法产生的内在逻辑规律;所谓外部史主要关注科学知识创造的外部条件和体制,力求阐明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 (在近现代主要表现为政府、高校、学会、科研机构、企业、出版社以及各种组织、团体和机构的影响与作用)。在此基础上,库恩进一步区分了科学外部史的三种形式,即科学制度史,史学家关于科学与思想、文化关系的考察,结合制度考察和思想考察来研究科学的某一具体领域的学科史。^①如果说科学史偏重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历史而学术史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那么依据同理也可将学术史视为由其内部史和外部史所构成。

应该说,上述观点迄今已获得国内学界的普遍认可和采纳。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对学术史的考察主要有内外两种研究方式”,并具体解释道:“学术史内在理路的研究通过对学术大家的思想的解释和阐发,从而把握学术思想内在发展线索。比如,梁启超和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这种观念史研究的范例。而学术史外在理路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学术内外的社会因素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比如,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就是这种社会史研究的范例。”^②有的专家

^① T. S. Kuh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4,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pp. 74 - 83.

^② 应星:《蔡元培治校与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兴起——1917—1923年的北京大学》,《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编:《教育与现代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7页。

强调：“中国学术之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层面的演变，二是制度层面的演变。具体到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则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本身的转型，而且体现在学术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学术制度之转型。”^① 笔者也曾指出：“概而言之，学术史的研究主要有内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即偏重‘内在理路的研究’和偏重‘外在理路的研究’。前者旨在通过对学术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的考察和分析来揭示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线索，因而重在学术的观念和理论层面……而后者则侧重于考察和分析学术与社会（主要包括政府、大学、学会、企业以及各种组织和机构等）的互动关系，力求阐明影响和制约学术发展的各种外在社会因素，因而重在学术的实践和制度层面。”^②

许刘英的专著《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即依据并贯彻了学术史由内部史和外部史构成的总体思路。本书结合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产生、发展的实际状况，运用学术内部史和外部史相结合的分析框架，既考察了近代中国高校教育社会学的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又探讨了近代中国教育学会、期刊对教育社会学创立和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既论述了陶孟和、雷通群、卢绍稷等个别代表人物创建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理论的业绩及其主要观点、思想，又分析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群体的构成及其基本特征；既围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题、学科性质、功能等核心问题从理论层面上考察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又把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与乡村建设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从实践层面上揭示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对其理论研究和发 展所产生的意义及影响。全书主题集中，条理清晰，结构严谨，逻辑性强，不仅在学界率先系统论述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建立、发展的历史，而且较大程度上深化了中国近代教育学术史的研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水准。具体而言，本书的主要价值和突出特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勾画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体制化、制度化的历史面貌。如上所述，学界一致认为高校、学会、期刊等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对学术人才的培养、学术活动的开展、学术思想的交流以

^① 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② 肖朗、项建英：《学术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及学术成果的发表、传播和推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平台。有鉴于此，本书主要采用学术外部史的分析视角，对近代中国高校教育学科、教育学会、教育期刊所开展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传播工作进行了综合考察，特别是将中央大学教育社会学系的建制及其所开展的教学、科研工作作为典型个案加以深入剖析，并力求阐发它们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体制的重要环节对推动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分析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正是凭借高校教育学科、教育学会、教育期刊等平台而形成“学术共同体”，并从国外思想因素的影响、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关注中国教育现实问题等三个方面揭示了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

其二，力求分析揭示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为此，本书又采用了学术内部史的分析视角，针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如陶孟和及其《社会与教育》、雷通群及其《教育社会学》、沈冠群（解放后改名为沈灌群）和吴同福及其《教育社会学通论》、卢绍稷及其《教育社会学》、陈科美及其《教育社会学》，从观念和理论研究的角度力求揭示贯穿其中的内在逻辑线索，从而说明了这些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对中国近代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和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和梳理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者关于教育社会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及主题、学科性质及功能等学科核心理论问题所发表的观点、见解，并指出从思想来源看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主要接受和借鉴了以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派”教育社会学理论，以美国教育学家史密斯（W. R. Smith）、司纳顿（D. Snedden）、克劳（F. R. Clow）、彼得斯（C. C. Peters）等人为代表的“应用派”教育社会学理论，以及以法国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涂尔干等人为代表的“功能派”教育社会学理论。

其三，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紧密结合起来，以求展现近代中国教育学家及教育社会学学者推进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及其努力，可谓本书的又一明显特色。总的来说，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是在导入和吸收欧美教育社会学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如何使外国的教育社会学转化为中国的教育社会学，即教育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始终是近代中国广大教育学家及

教育社会学学者关注的中心课题，同时他们也充分认识到中国自古为农业大国，乡村堪称中国社会的“主角”，也是新教育亟待推行之地，因而十分重视乡村建设和教育。随着20世纪20—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许多教育学家及教育社会学学者投身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他们认为乡村教育理应成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于是一方面注重乡村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调查，另一方面积极创办各种乡村教育实验区，并努力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构建“中国化”的教育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和现实素材。崔载阳在参加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乡村教育实验活动的过程中提出了“民族中心教育”思想，邵爽秋在领导开展“念二运动”期间阐发了“民生本位教育”主张，廖泰初通过参与燕京大学“乡村社区教育研究”项目而确立了教育社会学“原野调查”“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本书通过列举和论述这些生动案例较为深入地阐析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与乡村建设运动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即前者推动了后者，后者又“反哺”了前者。

经过上述一系列分析和论述，本书首先认为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构架已基本形成，主要包括“理论—实践（实际）”“本质—方法”“理论—实践（实际）—方法”等类型，其学科方法论也已初步确立；继而，本书主要从丰富教育学的研究内容、促进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两方面，力求论证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有助于推进近代中国教育学的“科学化”趋势；最后，本书指出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实证性研究相对薄弱”“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制度化的建设很不完善”“出版物以教科书为主，缺少专题性研究成果”等方面。上述结论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发前人所未发，颇具创新意义。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西方“分科治学”的理念、近代教育制度以及各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但直到20世纪初才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近现代学科。进入21世纪，国内学者普遍围绕着各门学科的百年变迁，开始系统回顾并总结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史。据笔者之管见，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遥居领先地位，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则为“后起之秀”；就教育学各分支学科而言，虽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说仍处于起步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可谓弥补了中国近代教育学术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本书作者早年就读于徐州师范大学（现改名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历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方面奠定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后又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深造，加强了教育学原理、中外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等方面的理论素养。笔者作为其博士生导师，对她取得的研究成果感到十分高兴，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写下上述文字，既有意向读者推荐中国近代教育学术史研究的这一新成果，也希望作者以此为新起点，再接再厉，不断探索，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肖 朗

2015年10月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本序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1)
二 文献综述	(3)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
第一章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兴起	(16)
第一节 清末新式教育与近代学科体制的建立	(16)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	(28)
第三节 陶孟和与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端	(43)
一 陶孟和的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研究概况	(43)
二 《社会与教育》：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端的标志性研究 成果	(47)
三 陶孟和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的贡献和影响	(54)
第二章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建制	(60)
第一节 近代中国高校教育社会学的课程设置	(61)
一 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高校教育社会学课程的创设	(61)
二 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高校教育社会学课程的调整	(76)
三 教育社会学课程在部分中学和师范讲习所开设概况	(83)
第二节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群体及其基本特征	(84)
一 学会、期刊与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群体	(84)
二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群体的构成	(90)
三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群体的基本特征	(92)
第三节 个案考察：中央大学教育社会学系	(106)
第三章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118)
第一节 国外教育社会学的译介与导入	(118)

一	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119)
二	译著特点、成就之分析	(128)
第二节	教育社会学学科要素探讨	(135)
一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主题	(135)
二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138)
三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功能	(140)
第三节	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探索	(142)
第四节	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尝试	(149)
一	雷通群与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	(149)
二	卢绍稷与教育社会学的“中国化”	(164)
第四章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与乡村建设运动	(180)
第一节	教育社会学学者与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研究	
—	以余家菊为考察中心	(181)
一	余家菊的乡村教育研究历程	(181)
二	《乡村教育通论》：乡村教育研究的综合性成果	(187)
第二节	教育社会学学者投身乡村建设运动	(198)
一	谋“民族中心教育”之实现——崔载阳与国立中山大学 教育研究所乡村教育实验	(202)
二	促“民生本位教育”之普及——邵爽秋与大夏大学的 “念二运动”	(214)
三	觅教育研究之新途径——廖泰初与燕京大学“乡村社区 的教育研究”	(224)
第三节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与乡村建设运动的互动及其 影响	(237)
一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对促进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	(238)
二	乡村建设运动对教育社会学的“反哺”作用	(247)
第五章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主要成就、学科地位及其 局限性	(255)
第一节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主要成就及特征	(255)
一	学科理论构架基本形成	(255)
二	学科方法论初步确立	(261)
第二节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及影响	(264)

一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	(265)
二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与教育学“科学化”	(271)
第三节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局限性	(283)
附录一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译文篇目汇编	(288)
附录二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大事记	(291)
主要参考文献	(294)
后记	(310)

绪 论

一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教育社会学是教育学专业的基础学科，也是社会学专业的分支学科。它作为一门专门的、独立的学科起源于欧美，是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欧洲社会急剧转型、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育社会学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我国教育社会学学科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1922年陶孟和所著的《社会与教育》一书为其确立的主要标志。自此以后直到1949年，教育社会学研究在我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学界既翻译介绍了国外一些重要的教育社会学代表作，也有相当数量的教育社会学论著相继问世，同时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课程不仅在大学，甚至在部分中学、师范讲习所开设，许多学者也因此称之为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的萌芽期或创建期^①。尽管如此，有些学者仍认为这一时期的教育社会学“尚未具有独立学科的地位”“尚无多少实在的研究”^②。也许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对这一时期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教育社会学的研究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个别材料引用上存在若干不当之处和对基本史实的误解，如把同一

① “创建期”的说法主要见于：高旭平《教育社会学在中国》，《现代教育》1993年第2期；李锦旭《中文教育社会学的回顾与展望》，《佛光学刊》1996年“创刊”；程天君：《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论”百年概要》，《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年第4期；侯怀银、王晋：《20世纪中国学者对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3期；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②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著作的作者误认为两位^①；而且，在众多教育社会学或教育史的著作中，对这一时期以及整个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状况都着墨较少，没有展开充分的研讨。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影响学界对我国教育社会的认识和把握，甚至会影响当前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正如梁启超所说，“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②。有鉴于此，本书作者拟以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发掘和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多方位、多视角地揭示教育社会学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本课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百余年后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分支学科都在系统地回顾本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试图用学术史的分析框架全面梳理本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和总结学术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关于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却鲜有人问津，那些为数甚少的先期研究成果也仅限于考察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领域的个别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而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建制、人才培养、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却未予以深入的研讨。众所周知，一门学科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必然会影响这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这种情况对于新中国成立后被迫中止研究近三十年时间^③的教育社会学来说尤为严重。应该说，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不仅有助于厘清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自身的历史，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百余年来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如何创建的过程。

其二，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教育社会学是伴随着旧教育的解体与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而在中国诞生的，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

① 将《社会与教育》的作者陶孟和与陶履恭误认为是两个人，这种错误笔者见到如下两处：（1）李长伟、杨昌勇：《20世纪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回顾》，《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3期；（2）侯怀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276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③ 多数学者把这段时间视为教育社会学的“停滞期”，如叶澜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李长伟、杨昌勇：《20世纪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回顾》，《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3期。

成部分。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尤其是到20世纪初,教育是社会改造的工具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但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没有得到合理的理论解释。教育社会学作为密切联系和沟通教育与社会的学科,主张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教育目的、制定教育政策,符合当时教育改革和思想理论界的需要。因此,通过对教育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其三,通过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历史开展实证性研究来探索和总结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这将为促进和加强当前我国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事实上,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无论在学科建制、人才培养方面,还是在理论框架、研究方法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也存在不少问题,其长期积累的经验教训对当今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来说仍是一笔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任何一门学术的产生和发展都脱离不了一定的社会环境,因而探讨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注重把握学术与制度、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及其影响,对于推动当前我国教育社会学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一) 先期研究成果综述

总的来说,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系统、深入地考察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就目前而言,学界出现了一些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学科、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研究成果;另外,在有关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学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本课题的研究都有着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1. 关于“学科”方面的研究

“学科”一词是清末新式学堂采用分科教学以后才逐渐由西方引进的一种知识分类概念,它具有教学的科目、训练、训练的方式、纪律、处罚以至熏陶等多重含义。^①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学科”这一概念从各个层

^① 霍恩比(A. S. Hornby)著,李北达译:《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08页。

面都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讨。鲍嵘在《学科制度的源起及走向初探》一文中从广义与狭义的角度对学科进行了划分,指出广义的“学科”指一般而言的学问分支或学术组织机构,狭义的“学科”是指高等学校利用学问划分来组织高校教学、研究工作,以实现高校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之职能的单位。^①李光、任定成的《交叉科学导论》一书对学科的特征作了阐释:“学科的特征在于它不依赖其他学科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反映在它的研究对象、语言系统和研究规范上。”^②刘仲林的《跨学科教育论》对一门成熟的学科所应具备的条件作了如下严格的界定:(1)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的规定;(2)是构成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最基本单位;(3)内含贯穿发展全过程的核心矛盾。^③万力维则在《控制与分等:大学学科制度的权力逻辑》一书中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学科含义的基础上将学科分为本指、隐指、延指三个方面,并分别解释道:“学科本指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延指围绕着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结成的学术组织,它为专门化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平台;隐指为实现知识的专门化、规范化,对研究对象与门徒予以规训和控制的权力技术的组合。”^④此外,学界还翻译了美国史学家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等人所写的关于学科体制的著作《学科·知识·权力》^⑤和《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⑥等。这些著述对笔者理解和把握“学科”这一概念很有帮助。

2. 关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方面的研究

台湾学者陈以爱指出:“过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著作,无不提及学术思想与世变之关系,同时亦注意及研究对象之家庭背景、求学过程、师友关系及人际脉络,以求索各种可能对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造成影响之

① 鲍嵘:《学科制度的源起及走向初探》,《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李光、任定成主编:《交叉科学导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③ 刘仲林:《跨学科教育论》,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④ 万力维:《控制与分等:大学学科制度的权力逻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⑤ [美]华勒斯坦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⑥ [美]华勒斯坦著,刘峰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因素。可惜的是，虽然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明显出现制度化的发展，然迄今尚未有一本专著，就研究机构之建立对推动学术成长所发挥的作用，作深入细致的分析”^①，并以其《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一书对近代中国学术体制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给人以很大启发。在此前后，台湾地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如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陶英惠的《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②、杨翠华著《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③以及刘龙心著《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④，等等。近年来，大陆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学术体制问题的研究，如徐明华著《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⑤、胡逢祥的《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⑥、孙宏云著《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一九三七）》^⑦、阎明著《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⑧、左玉河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⑨，以及黄国庭的《教育刊物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⑩、杨卫明的《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⑪ 博士学位论文，等等，这些论著也开始注意考察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制度性因素，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对本课题的研究有很重

①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7期。

③ 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④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⑤ 徐明华：《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22期下册。

⑥ 胡逢祥：《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⑦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一九三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⑧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⑩ 黄国庭：《教育刊物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⑪ 杨卫明：《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要的启示。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当推左玉河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该书详细考察了近代中国学术制度各个层面：学术研究主体的转换，学术研究对象的扩展，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学术中心的转移，专业学术机构的设立，以及新的学术交流、学术评议、学术奖惩机制的建立等问题，^① 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总体的思路和视角，明确了教育社会学学科在近代中国是置于怎样的生存空间，以及如何在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寻找适宜自身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3. 关于教育社会学的研究

教育社会学自 20 世纪 20 年代由欧美传入中国，但 1949 年后我国教育社会学却没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生”，反而却因其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而备受打击，直至取消，因而 20 世纪 50—70 年代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80 年代后，随着我国社会学进入复兴与重建时期，同时由于我国教育学的研究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与之唇齿相依的教育社会学也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权利。重建时期的教育社会学在学科理论和制度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研究成果也颇丰硕。

作为教育社会学的文选目前已出版三本。一本是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②，该书收录了若干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范围上溯到西方教育社会学奠基者之一——涂尔干的著作，下至“新”教育社会学的标志性成果。一本是厉以贤主编《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③，该书共收集 44 篇文章，并按照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文化、教师的角色、课程知识社会学等七个不同的专题分门别类、由宏观至微观加以汇编。第三本是谭光鼎、王丽云主编的《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④，该书共涵盖当代国外 18 位颇具代表性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家，分成 18 章，每章内容均包括四部分：生平与重要著述简介、社会学思想背景与主要理论内容、对教育社会学理论与研究之贡献或启示、综合评述与结论。这些文选均反映了近代国外（主要指欧美及日本）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进展和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而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正是通过借鉴欧美和日本教育社会学

① 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 页。

② 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2009 年修订版。

③ 厉以贤主编：《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2 年版。

④ 谭光鼎、王丽云主编：《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